

她们从长征走来

■梅世雄

记忆

今年5月的一天，我在北京家中整理旧笔记。窗外是初夏的阳光，书桌上摊开的采访本已经泛黄——那是2004年春末夏初，我在江西、上海多地采访几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时留下的记录。一页页翻过去，纸上那些字迹忽然变得沉重起来：危秀英、王泉媛、叶冰、苏力，她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当军事记者27年来，我采访过200多位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新四军。这段采访经历，是我工作中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长征胜利90周年了。我把采访笔记重新翻开，把20多年前的那些对话，说给今天的人听。这不仅是为记住她们，也为记住长征路上更多的女红军。

一

2004年5月，我走进江西泰和一栋老旧的居民楼。穿过满是蜂窝煤渣的市场，在一道仅容一人进出的门洞里，见到了91岁的老红军王泉媛。

她身穿黑红条纹的外衣，微笑着伸出颤巍巍的右手。她长相端庄，虽已高龄，仍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。当时，我在采访本上记了一句话：“磨难的一生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明显印记。”

可她经受的磨难，是深重的。有人用9个数字概括王泉媛的人生：一生坎坷，两袖清风，三过草地，四爬雪山，五次婚姻，六个孤儿，七次遇险，八陷暗算，九死一生。

王泉媛16岁参加革命，是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。长征到达陕北后，她被任命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。西路军西征失利后，她被俘入狱，受尽严刑拷打，逃出牢笼后经辗转，还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1942年，她沿途乞讨回到家乡，从此下地种田，自食其力。我问她，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她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我后来了解到，她在家乡当了14年敬老院院长，分文不取，还收养了6个孤儿。直到76岁那年，王泉媛才被确认应享受老红军待遇。

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像王泉媛一样，奉献一生却从不问“值不值得”。

我在上海见到了老红军苏力。她身形娇小，说话时声音轻得像怕吵醒什么。她撩起袖子给我看——手臂上一道深深的凹痕。她撩起头发——额头上的一道明显的刀疤。这两处都是她小时候被地主婆用刀砍伤留下的。“不跟着红军走，我就没命了。”她说得很平静。

“寻亲”老兵

■孙福涛 向 勇

感念

对大连市普兰店区唐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员、“最美退役军人”张勇而言，这个夏天格外激动人心。历经两个月的不懈努力，他终于为金德田烈士寻找到了亲人。至此，他已为330位烈士找到亲属。

1947年辽南战役中牺牲的300多位烈士长眠于唐房革命烈士陵园，其中有108人连姓名都未留下。2006年，陵园重修，退役多年的张勇来到这里工作。初到陵园，只见荒草没膝，碑石风化，有的石碑只剩半截，有的仅刻着模糊地名。张勇在烈士墓前沉默良久。他想起曾是老兵的父亲讲述的生死相依战友深情，一股滚烫的执念在心头燃起：不能让英烈埋骨他乡无人知晓！

然而，当他说出守护陵园、为烈士寻亲的想法时，质疑声随之而来：“图个啥？”那时，家中孩子正备战高考，妻子患病也需人照顾。但当张勇第一次面对烈属充满期盼却又难掩失落的目光，听到那句“同志，您能告诉我，我家亲人葬在哪里吗”，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兵瞬间红了眼眶。

此后，张勇如同一位专注的“历史侦探”，仔细端详摩挲碑文，辨识字迹，重新记录。面对风化残缺的石碑，他反复比对史料线索，结合掌握的陵园资料，力求最大程度还原相关信息。经过日复一日的坚持，他最终绘制出完整的陵园烈士安葬位置图。

孙长田烈士的墓碑上只刻着“辽东省新金县”，民政名册里仅有姓名，再无其他信息。张勇拨打原新金县辖区各乡镇的电话，四处求助未果，又奔赴大连市档案馆、辽宁省档案馆。终于，他在一本1950年的泛黄名册里，找到了关键信息：孙长田，新金县皮口镇崔家窑村人。当他驱车赶到烈士故乡时，烈士的弟弟、84岁的孙长德老人，泪水一下涌了出来：“我们找了70年，终于找到哥哥了！”

这些年，张勇为烈士寻亲的脚步从未停歇，其范围不仅包括安息在唐房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，也涵盖周边地区的烈士。

2025年，一则消息令张勇热血沸腾：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身份确认，其中就有他倾力协助寻亲的辽宁凤城籍烈士——杨忠贵。1951年，杨忠贵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。此后的岁月里，家人只知道他是烈士，却始终不知英魂归处。张勇获悉后，第一时间在朋友圈、微信群征集线索。很快，信息传来：当地同姓同姓同名的“杨忠贵”烈士竟有两位。张勇决定从两位烈士的入伍地入手，迅速联系当地部门，协助采集烈属DNA样本。当DNA匹配成功的消息传来，电话那端，烈士的家人已经泣不成声。

张勇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叠叠寻亲档案。上面印刻着他跋涉的足迹：走过16个省级行政区，行程逾2万公里；走访烈士亲属与战友近千次；甄别各类线索2万余条；核实、完善烈士信息1500余条。安葬于营口市老边烈士陵园的陶成堂烈士，碑文记载其生前为辽南独立二师

笑谈磨难的本事。

那次采访中，我还听说了一个小细节：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。一个人，究竟要累到什么程度才能站着睡着？我没有问她，因为我知道，她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——她们早已把“不可能”活成了“日常”。

2005年，危秀英病逝。我站在她的遗像前，想到那个只有1.4米高的身影，想到她抬过的一副副担架、救过的一个战友，我又觉得她是如此高大。

1933年，16岁的叶冰在家乡四川通江听到红军宣传员的宣讲：“当红军就能打土豪，就能解放穷人。”于是她参了军。

2004年我见到她时，她已经87岁了。回首往事，她依然充满激情地对我说了两句话：“虽然苦，但充满希望。”

1934年，红四方面军组建妇女粮秣队，叶冰和战友一起负责筹集粮食、盐巴等军用物资。1935年春天，她们登上木船竹筏，在枪林弹雨中强渡嘉陵江。叶冰当时还不知道，从渡江那一刻起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已经开始了。

最艰难的是翻越夹金山。那一天，叶冰背的粮食有60多斤重。还没爬到半山腰，狂风骤起，雪屑像刀子一样刺在脸上，冰雹紧接着砸了下来。当时，叶冰身上只穿着单衣。“简直比剑门关还难！”她对我说。

第三次过草地时，叶冰被调入红四方面军的医院当护士。当时药品极其匮乏，给伤员治疗时只能用盐水就着黄纸贴在伤口上。许多伤员的伤口流脓流血，甚至长了蛆。行军途中，衣服只能在水里搓搓就穿在身上。虱子在身上滚成团，休整时战友们互相捉虱子，投入火里烧。

我问她，那么苦，是怎么撑下来的？她就说了4个字——“充满希望”。

后来，叶冰被安排给白求恩大夫当助手。白求恩对她说说过一句话，她记了一辈子：“你今天做得不太好，医护人员再累，也不是对患者不负责任的理由。”

从雪山上的背粮女战士，到受白求恩言传身教的女护士，再到晚年说起往事仍双眼发亮的老战士，叶冰的人生印证着那句话：“虽然苦，但充满希望。”

三

王泉媛、苏力、危秀英、叶冰似乎又是幸运的，她们走过烽火征途，迎来和平与安宁的生活。牺牲在长征路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人，有很多。

长征出发前，中央红军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名单上共32人。出发时，彭儒、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，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。她们加入长征的条件极为严苛：必

四团七连战士，于辽沈战役中牺牲，亲属信息缺失。张勇从陵园档案入手，系统梳理大连市、辽宁省两级档案馆馆藏史料，细致比对辽南战役相关记录与烈士名册，并重点筛查在辽南军区后方医院救治无效的牺牲者信息。经逐步排查分析，他最终确认烈士的亲属定居于普兰店区。不久后，陶成堂烈士的孙子在墓前完成了迟到70多年的祭奠。他对着墓碑倾诉道：“爷爷，奶奶等了您一辈子，父亲也已年迈……今天我替全家来看您了。”

“烈士的故事，不能被遗忘。”为烈士寻亲之外，张勇还担任红色故事宣讲员。他自学党史军史，熟记烈士的事迹，把冰冷的文字记录转化为有温度、有力量的故事。在他的讲述里，英雄的形象鲜活而崇高。

如今的唐房革命烈士陵园，碑石整洁、松柏苍翠，先后获评“辽宁省未成年人教育基地”“辽宁省国防教育基地”，成为辽南大地醒目的红色教育园地。每逢清明、烈士纪念日，都有不少人前来陵园祭扫。其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，有朝气蓬勃的少年，也有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烈士亲人。

20年来，老兵张勇默默守护着这片忠魂安息之地。当又一个名字被确认，当又一份思念跨越时空得以安放，他脸上总会绽出质朴的笑容。望着陵园的烈士墓碑，张勇的目光坚定而深远——只要还有一位烈士在等待，他手中那盏名为“奉献”的灯，就将继续燃着，照亮为英烈寻找亲人的路。

须是中共党员，必须有独立工作能力，必须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环境。

行军中，不断有人因伤病掉队。当时有项规定，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，部队会给8块大洋，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。因而，在女红军中叫响着这样的口号：“不掉队，不戴花，不当俘虏，不得8块钱。”

长征路上，她们是宣传员，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，传播革命火种。她们是卫生员，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，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伤病员。她们肩负着后勤保障任务——筹集粮食、搬运物资、缝制军衣。

长征开始时，由于怀有身孕，曾玉没在转移名单中。但当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，她竟不顾一切地挺着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。部队过老山界时，她的女儿降生了。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曾玉只得狠心将女儿留在当地，女红军们则架起产后身体虚弱的曾玉继续赶路。

四

我合上采访本，看着窗外北京的阳光，思绪万千。

危秀英去世后，我站在她的遗像前想了很久。后来我写下：“想到这位走过了长征路、打过游击战，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，从此再也不会醒来，我的心中一阵酸楚。”

苏力走的那天，我翻出当年的采访录音又听了一遍。她的声音很轻，讲到那位救她的大姐姐时停顿了很久。2009年4月，王泉媛去世的消息传来时，我又想起她笑着和我握手的样子。

20多年前，我带着录音笔和笔记本走南闯北，觉得自己是在“采访”历史、“记录”历史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在与活生生的历史握手。她们的口音、掌心的温度、讲述时眼眶里打转的泪水，本身就是历史。

当年那些在雪山草地上艰难跋涉的身影，绝大多数已经远去。但长征女红军的故事，正以多种方式被后人铭记与传承。在甘肃张掖，“长征女红军暨妇女抗日先锋队”专题展览，吸引着一批批观众前来参观。在福建，青年学子和教师踏上寻访之路，追寻邓六金、吴富莲、谢小梅等女红军的足迹，开展“寻访巾帼足迹，赓续红色血脉”主题调研。在四川，今年已105岁高龄、亲历长征的女红军王金英深情嘱托：“要多讲长征故事、红军故事、英雄故事，让英烈事迹永载史册、英烈精神代代相传。”

苏力、王泉媛、危秀英、叶冰都走了。但她们走过的路，正在我们脚下延伸。她们举过的火把，还亮着。



迷彩年华

■程荣贵

我把青春装进背囊
伴着黎明月光
和头顶的点点星光
告别爸妈和故乡
一身戎装
扛起年少时的憧憬

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
磨去身上的稚气
汗水在不知不觉中
深深浸透
心中滚烫的梦想
铿锵脚步
沿着先辈的足迹
踏破前路迷雾
青春热血
激荡在年轻的胸膛
凝聚成肩头的使命担当

我紧握钢枪
为祖国放哨站岗
守护身后万家灯火的安详
我的责任
就是守卫脚下的土地
钢枪所指，大地安宁
我的身躯如界碑挺立
我的忠诚永远闪亮

人在军旅

新兵黄伟淦分到炮兵连后，领到的第一件“武器”，是一根磨得锃亮的送弹棍。

他的岗位是火炮装弹手。看着同班战友在炮位上计算诸元、修正偏差，而自己却守在炮尾，重复着将炮弹推入炮膛的动作，黄伟淦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羡慕，还夹杂着一丝失落。

班长察觉到他的心事，“是不是觉得装弹这活儿太简单，不起眼？”黄伟淦默默点了点头。“炮弹推不到位，炮就打不稳，打不准。”班长语气郑重，“这活儿看着没多少技巧，但要保证每一发都推到位，手上得有准头，心里得绷着弦。”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“说起来，咱连队历史上还真出过一位了不起的装弹手。等去连队荣誉室参观时你就知道了。”

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加之初学时动作僵硬、发力别扭，握持姿势不标准，在送弹棍不断的摩擦与挤压下，黄伟淦的手掌很快磨出了血泡。

“反反复复都是这些动作，磨破手又有什么用？”疲惫与迷茫缠上心头。他的动作渐渐慢了，送弹开始懈怠，推送时力道也少了几分。

一次主题团日，黄伟淦随队走进连队荣誉室，听排长动情讲述连队“百发百中”的辉煌战史。排长驻足于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前：“看，这是1948年襄樊战役中，我们连一个炮班战斗的瞬间。”他指着照片中一位战士，“这位叫张奉煜的装弹手，在那场战斗中，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。”

黄伟淦愣了一下。班长说的“了不起的装弹手”，原来就在眼前。

1948年7月15日晚，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集中炮火猛轰襄阳西城门，持续了约30分钟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张奉煜手中的送弹棍竟被顶断了！为了使战位上的炮火不中断，张奉煜直接用手托住炮弹底部往滚烫的炮膛里推。手背和手臂被烫得起泡，但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一发又一发地装填，直到战斗结束。

从连队荣誉室返回训练场，那张老照片和前辈张奉煜空手推送炮弹的身影，不时浮现在黄伟淦的脑海。想着想着，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送弹棍，掌心伤口的疼痛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抚平了。他推送炮弹时，力道不自觉地沉实了几分。

“这次力度够了，但角度还差一点。来，我再给你示范一遍。”班长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改变。从握棍的高度、腰背发力的传导到推弹瞬间的节奏把握，班长将每个细节掰开揉碎，又一遍遍带着他反复练习。那天，是黄伟淦入伍以来听得最专注，练得最投入的一次。

黄伟淦的手掌经历着磨破、渗血、结痂的反复，变得粗糙厚实。

不久后，连队整建制开赴某地，参加实弹射击考核。这是黄伟淦军旅生涯的第一场火炮实弹射击。

阵地上，火炮列阵，炮管高昂，直指远方靶区。“注意，4炮1发，装填！”

口令传来，黄伟淦应声而动。送弹、推弹入膛、闭合、归位，所有动作一

火炮装弹手

■张飞龙

气呵成。“咔嚓！”炮弹顺利嵌入炮膛，声音没有半分卡滞。

“预备——放！”“轰——”炮口烈焰喷吐，灼热气浪混合着硝烟瞬间席卷阵地，大地随之震颤。那撼人心魄的轰鸣，让黄伟淦激动不已。

来不及多想，他迅速复位。推弹上膛，动作干净利落。一发发炮弹呼啸着扑向靶区，精准命中。

考核结束，黄伟淦所在炮班成绩出色。

“送弹力度过轻，炮弹定位不稳；用力过猛，又会带偏炮管姿态……”在连队总结会上，黄伟淦第一次站在全连面前，分享自己的实操心得。

班长随即向连长建议：“黄伟淦最近进步很明显，是个有悟性的好苗子，可以多压担子，给他些锻炼机会。”连长采纳了建议，安排黄伟淦担任连队的“装弹手小教员”，负责带教新兵基础动作。

此后，训练场上便多了一个忙碌的身影。黄伟淦一板一眼地指导着新兵：“装填炮弹看着简单枯燥，却是火炮打准打稳的关键一环……”以前班长讲述的道理，如今由他清晰地传递给新兵。

20天后，又一场考核来临。凭借这段时间的专攻精练，各炮位协同配合默契无间，动作精准流畅。考核场上，全连以精准命中的成绩，一举夺得旅里“神炮连”荣誉。

表彰会上，全连官兵簇拥着闪亮的荣誉奖牌拍照。当奖牌传递到黄伟淦手中时，沉甸甸的分量抵在他掌心厚实的老茧上，他感觉内心无比踏实。那一刻，连队荣誉室那张泛黄的老照片，以及照片上那位同样坚守在炮尾的身影，再次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。



浩气长存——大别山革命英雄纪念碑（局部，纸本设色）

陈良才作

长征

第6742期